

# 跳出生態看生態

——以中國當代鄉村建設實踐為例

潘家恩（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日益“時尚化”的生態議題絕不是少數人製造出來的末日預言，它是真實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普遍現實，也作為當代鄉村建設相比歷史實踐所新增的內容與角度。對於國家來說，它意味著能源緊張、環境污染、物種急劇減少；對於農民來說，它意味著自己及後代是否有田可種（土地板結），是否有水可澆（水位下降並污染），是否還能種的起地（種子、農資、灌溉成本增加）等問題。而對於城市消費者來說，它意味著是否還有可能讓自己和家人吃到真正健康的安全食品。

正如汪暉（2008）所指：“生態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生態問題，而是整個發展模式的問題”。其表現出的問題和危機與現代化依靠轉嫁“成本”才得以實現的普遍邏輯與整體困境有著內在相關。因此，生態可持續既是當代鄉村建設新的工作內容與面向，更是鄉村建設結合其它工作進行深入思考的重要角度。所以，鄉村建設必須討論生態與可持續議題，但需要結合以更廣闊的視野。下文將結合筆者所參與的實際案例展開分析。

## 1、毛驢、牛及其它

2005年春天，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內部有一場非常激烈的爭論，前後討論半個多月，為是否要養一頭毛驢。

支持者認為：牲畜曾經在鄉村扮演著重要角色，農耕的歷史其實也是畜耕的歷史。由於石油農業與化學農業的到來，那些世代和農夫一起耕耘了幾千年的牲口從土地裡“解脫”了出來，農業也似乎獲得前所未有的大豐收。但短短的幾十年，各種蓄力牲畜（牛、毛驢、騾子等）迅速地從田野裡消失，特別是在已經高度機械化的華北平原。與之相伴，在農村掌握駕禦牲畜技術的農夫也日益減少。既然鄉建學院需要發展生態農業，畜力的使用與相關反思自然是很重要的方面，它既可為學院翻耕農地提供不依賴石油的持續動力，也不會有其它污染。又因鄉建學院是公眾教育平臺，一頭活驢可成為當前能源與生態危機下思考另類出路的

好教材，也是探索實踐“生態技術”與思考“生態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反對者認為：養驢是一種倒退，石油怎麼會沒有呢？農民都已經不養驢了，我們這些剛剛下鄉的“秀才”<sup>1</sup>是不是太“浪漫”了？想開時代倒車？如果真的想演示毛驢在傳統農耕中的角色與作用，拍成照片或錄影即可。而且養驢成本很高，如此是否過於極端，把可持續理念僵化……，它也一定會遭受外界的普遍攻擊，況且略有耳聞的村民已經在暗暗嘲笑我們“傻、落後，不求上進”了。

雙方爭持不下，更多村民得知後，意料之中地表示了非常強烈的不解與反對。最後，不得已之下由溫鐵軍院長的妻子個人出錢認養，並對其擁有“教授”的命名權，才平息了這場風波<sup>2</sup>。

從此以後，這頭頗具爭議的毛驢“教授”一方面勤勤懇懇地為清理校園搬磚拉瓦，在拖拉機進不去的地方翻耕土地，更顯優勢的實踐著生態農業所宣導的多样化種植。另一方面，也繼續成為一個飽受議論的“活教材”，很多在都市中呆膩了的參觀者，或新奇或嘲諷的觀看並評說著，連同那些召回毛驢的青年志願者們。

2010 年的又一個春天，我們把這頭飽受爭議的“毛驢教授”迎接到受其啟發並以之為名而辦起的小毛驢市民農園。但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經告別畜力的北京郊區農場裡，這頭毛驢更加寂寞甚至生存艱難——既因周圍很難找到同類夥伴，它的大小疾病更難獲得應有的治療。

有過較多接觸的小毛驢市民農園工作人員和志願者都對“毛驢教授”的困境與難處有所認識，而類似尷尬還發生在同樣有著悠久農耕文明的鄰國印度，從“聖牛”到“瘋牛”的例子揭示了發展中國家傳統農業的普遍宿命。

牛，在印度被認為是聖牛，是印度文化的象徵，並且還有宗教的情感在裡面。“印度牛不需要與人爭奪食物，而且還提供有機肥，印度村莊所需能量的三分之二來自 8000 萬頭牛的牛糞燃料。然而，這個以對牛的全面利用為基礎的可持續生態系統，卻在效率和發展的名義下解體”（范達娜·席瓦，2006:75）。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包括肯德基在內的跨國公司在長期以素食為主要飲

---

1 此說法引自某主流媒體批評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的專題節目《秀才下鄉》。其中，在 21 世紀從生產角度嘗試恢復蓄力則是這批“秀才們”脫離實際的一大力證。

2 詳細討論參見：黃志友，《毛驢的故事》，《足跡》，2008，國仁城鄉（北京）科技發展中心生態農業工作室編（內部刊物），第 158-159 頁。

食習慣的印度進行了各種宣傳<sup>3</sup>——肉食營養好，更容易讓人聰明，雖然深受瘋牛病衝擊的歐洲已經大大減少了肉類的使用。於是印度人的飲食習慣也逐漸發生變化，增長的需求相應被創造出來，越來越多的資源和土地被用來種植飼料，越來越多的“聖牛”被送進了屠宰場，而原來提供“畜力、有機肥、燃料”等多功能的“聖牛”被簡化為牛奶或牛肉生產工具。同時由於這些利用功能單一，以及由分散到規模化的養殖方式轉變，也使牛的種類和相關就業機會明顯減少。類似變化在范達娜·席瓦（2006:94）看來：“正使隱喻著生態文明的印度‘聖牛’變成了隱喻著工業文明的‘瘋牛’”。

毛驢和牛不僅作為物質性的存在，其作為自給自足傳統農耕文明的一個縮影，同樣還以特定的位置處於一整套“正向運動”參照下的“意義系統”中：慢（低效率）、麻煩（日常需看護）、風險（生病或死亡）、低技術含量、不衛生、落後……。總之，不符合現代農業的產業化與規模化方向，但它們無疑都只是相對於工業文明與現代社會之座標，如果轉化為以農業文明或生態文明為座標，很多情況可能會有所不同。除“生產/生活/生態”不應割裂對待外，象徵“落後”的毛驢和牛實際也是可持續和生態迴圈的象徵，其帶出了傳統農業的重要原理——善於巧妙安排和利用不同生物的共生互養關係。而從物質再生產過程看，傳統農業和現代農業的重要區別在於：前者主要使用人畜力、比較簡陋的農具和農家肥，屬內迴圈。後者大量使用機械、電力、化肥、農藥，屬外迴圈<sup>4</sup>。“正是這種外部投入，現代農業才可能大幅度提高產量和勞動生產率，但由此導致其自我穩定功能大大降低，在自然和社會兩個方面都喪失了可持續能力”（魯靜芳、左停、苟天來，2008：17—19）。中國科學院石元春院士也因此指出（2006）：“現代農業更加開放，開始進入了一個更大的循環系統，但其帶來的結果是：高投入、高產出、高成本和高資源環境代價”。

---

3 這種宣傳既具全球性，更是現代食物體系的普遍事實：“美國農業部 3.33 億美元（2003 年）的營養教育預算，與食物與飲料公司的“營養教育”（廣告費）相比，少得可憐，它僅是百事和可口可樂兩家公司（12 億美元）的 27.8%，是八家食物集團（66 億美元）的 5%。消費者被誰教育，被誰洗腦，一目了然”（周立，2010：45）。

4 如文佳筠（2011：40）所述：“大規模單一化種植使得大部分食品需要長途運輸才能到達終端市場。2001 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中西部地區的食品，從農地到餐桌，平均經過 1518 英里（2429 公里）的長途跋涉。同時隨著產業鏈的加長，消費者支付的食品費用更多的用於運輸費、包裝費、人力費和銷售產品所需的各種投入，農業生產者得到的比例不斷降低，面臨‘不擴產，就出局’的選擇。依靠大型農業機械和化肥農藥、長途運輸，所有這些因素綜合起來，使得美國農業是世界上耗能最高的農業。每生產 1 卡路里的食品，就需要投入 10 卡路里的化石燃料。這種所謂的現代農業，其實是利用土地把化石能源轉化成食品。”

無論是中國的毛驢還是印度的“聖牛”，自然都不是孤立性的存在，它們背後是一整套的做法、文化與價值。當我們遮罩了所有的這些，在承載它們的生活方式、社會基礎與認識座標不復存在的條件下，抽象意義上的毛驢和牛——除食用價值外，就像動物園裡的其它動物一樣，只具備有物種或某些懷舊價值，當再度被強行拉入我們的眼前，自然顯示出渾身上下的不協調。

與拖拉機取代耕畜同時出現的，還有化肥、良種、農藥、除草劑、大規模單一種植等，它們都被歸類於一個很好聽的變革——“綠色革命”。然而“綠色革命”其實並不綠，也沒有真正解決糧食生產問題<sup>5</sup>，其高產的定義僅基於狹隘的效益觀與嚴格的排他性。全面採用依賴石油的“綠色革命”不僅直接參與著全球氣候的變化，它更以勝利者的姿態與優越感，深刻的摧毀著大部分農業人口相對“低碳”的傳統生活方式，並實際聯繫著十分重要的經濟利益與“冷戰”政治脈絡（J·陶德，1983：106；樂鋼，2000：228-229；馬格林，2001：280；徐國偉，2003：34-39；范達娜·席瓦，2006：9；阿圖羅·埃斯科瓦爾，2011：184-185）。

正是在“豐收”的名義下，始終由發達國家操控著的“綠色革命”一方面在那些渴盼著與世界接軌的廣大前殖民地或發展中國家所向披靡，並深刻的影響著這些國家的種植結構與耕種模式——“綠色革命”影響下使用農藥化肥正成為當下農民理所當然的新常識。讓農民重新相信不用農藥化肥也可以種出東西，已經日益困難。另一方面，數十年來與“綠色革命”所衍生相關投入品和產出品的加工、貿易、技術、宣傳媒介等產業資本已經在這種生產方式之中形成了複雜的利益關係，不可避免地對其後的發展與制度變遷形成一定的路徑依賴，各種利益集團及其代表都不大可能為生態文明和人類的可持續發展讓出眼前利益（溫鐵軍，董筱丹，石嫣，2010）。

所以，只有將毛驢和牛置於歷史性脈絡與結合起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整體性視野下，才能準確的加以理解。與其說僅是毛驢和牛們的尷尬，不如說是我們自己的實際處境，更是當代社會文化脈絡下恢復傳統農耕及嘗試更為根本的去思考與鄉建實踐所面對的深層困境。

## 2、農民的選擇？

---

5 恰恰相反，正如 E. F. 舒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1985：1）全書第一句話所提出的重要命題：“我們時代最重大的錯誤之一是相信‘生產問題’已經解決。”至於作者為何這麼認為，全書有深入淺出的論證。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農民的選擇卻不斷減少。但越來越多人仍然堅持認為“綠色革命”與化學農業的“勝利”是農民自己的意願和選擇，正是他們“用腳投票”的結果。否則，當初毛驢之爭中，為何是與毛驢最有感情的農民會成為最大的反對力量？

然而這種農民“自動”淘汰毛驢的說法首先抽離了中國上世紀 50 年代國家工業化這一重要的歷史背景，在人地關係高度緊張的基本國情限制下，讓小農放棄靈活的牲畜而自動選擇農機無疑非常困難，但因朝鮮戰爭與“國防需要”，在接手蘇聯援助全套重工業生產線的特殊條件下，利用農業合作化自上而下進行農機化推廣，本身就與統購統銷及人民合作社體制一樣，都是特殊時期的“國家戰略需要”<sup>6</sup>。同時，人民公社這一特殊體制依靠組織的力量，也代為承擔了新技術推廣應用中的較大風險，改變了傳統小農面對新技術時的謹慎與保守<sup>7</sup>，使得“許多新的農業技術通過人民公社的一次次會議引進了自然村落”（張樂天，2005：232）。

在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舉辦的農業交流會上，全國各地的老農回憶了農藥、化肥的推廣過程：最初老百姓是排斥這些東西的，它們刺鼻的氣味使農民覺得這些是對生命有害（後來事實證明正是如此），然而政府強行把這些東西“扔”到農民的土地上，因為只有這些代表著“進步”與農業“現代化”。在當前的新條件下，雖然很多農民也意識到農藥化肥本身的問題，但農民依然選擇它們，因為他們有著更精確的計算：如果減少化學投入，則不僅需花費更多時間和勞力，而且還需更多的現金成本<sup>8</sup>，在當前更大外部環境與參照座標不發生改變的情況下，實踐有機農耕反而對農民來說意味著高風險<sup>9</sup>、低回報和低競爭力<sup>10</sup>。

這種整體的悖論性困境<sup>11</sup>，不僅存在於中國。在印度學者帕沙·查特吉

---

6 詳見溫鐵軍《“三農問題”與制度變遷》（2009）中的相關分析。

7 正是這種獨特脈絡與強勢體制才可能改變東亞小農的某種“風險厭惡”，因為“如果‘最高和最穩定’這對目標發生衝突，那麼，處於生存邊緣的農民通常要選擇低風險的作物與技術”（詹姆斯·C.斯科特，2001：24）。

8 我們原來認為對農民來說轉向有機耕作會是低成本的，但是農民培訓中農戶們自己做的經濟分析卻讓我們看到：對於不少農民而言其實是高成本的，因為傳統的家庭迴圈經濟已經被破壞，很多家庭已不再養殖，所以大部分有機肥都要到外面購買，成本自然高昂。故鄉建工作不僅探討單一技術的研發與推廣，更應著眼於中國小農式家庭迴圈經濟重建，才可降低有機耕作“轉型期”的成本。

9 當缺乏有效辦法把分散的有機耕作者和新生的有機食品市場聯繫起來時，採用有機農耕對農民來說意味著要冒更大的風險。

10 如楊帥和溫鐵軍（2008）所指：“隨著近年來農民打工收入占比提高到絕對比重以上，原來因勞動力大量剩餘而極度壓低的農業勞動力價格，得以相對照於外出打工者的工資而顯化，進而導致農業生產中勞動力投入的機會成本上升，以致越多使用勞動力的有機農業就越缺乏市場競爭優勢”。

11 這種困境也可總結為：（產前）資本壟斷/技術異化、（產中）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產後）食品安全危

(2007: 196) 看來：“過去三十年中，隨著國家作用的深化，全球範圍內後殖民國家中政府技術的不斷傳播意味著政府對於農業群體而言不再是一個外部的個體。負責教育、健康服務、食品、道路、水電、農業技術、緊急救援和其他各種福利服務的政府機構已經深入到農民的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是，它不是一般的滲透，其更結合著價值、觀點等文化要素而表現出某種強勢的霸權性 (Hegemony) 力量。正如研究者所指，石油農業的主導性力量體現在——“雖然全球範圍內絕對意義上的機械化、石油化和化學化農業可能只有 3%，但這種數量上的少數卻可以成為全球范式，成為包括中國在內諸多後發國家模仿的對象<sup>12</sup>” (周立，2010: 25)。因此，農業改革並不是出於農業自身的意願，對於現代農業技術革命的需求，而更多是出自資本的需求，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現代農業的秘密就是用資本取代土地和勞動力” (呂新雨，2008: 127)。

面對生產要素市場化、人才城市化和資本全球化的多重壓力，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體前途不明 (何慧麗、古學斌等，2009: 5)。我們自然不應“歸罪”於中國農民採取不適當的農業生產方式，而更需體認“兩害相交取其輕”下農民的無奈<sup>13</sup>。況且這些選擇顯然不發生於孤立狀態下，它們多重受制於主流的文化、社會與經濟結構。

首先，在全面都市化浪潮影響與參照下，農耕漸漸剝離了原來豐富存在的生活方式功能與意涵<sup>14</sup>，而窄化為純粹的物質生產。在這樣的脈絡與背景下，農村經歷著不同程度的分裂——它為我們提供基本的食物來源，但城市才能滿足我們“欲望化”的需要；它可能是我們生產的地方，但卻不是我們期待著的生活樂土；它是將來不再年輕力壯者和競爭失敗者們不得不回來的歸宿，但城市才是他們年輕時的嚮往；它可能是我們的“童年”和“老年”<sup>15</sup>，但城市才是我們的“青年”。總之，曾經高度統一的生產和生活、生產和消費都不同程度地分離並

---

機。

- 12 如此才能理解，以美國為代表的大農場式石油農業何以用本國納稅人的錢去補貼其銷往全球的農產品。如此“低成本”的在全球範圍對傳統自足與本土農業穩態結構的打破，為外部資本的介入與主導全面掃清障礙，無疑是非常合算的“投資”。
- 13 如有實踐者在日常接觸中聽到了農民自己說出的困惑：“我祖祖輩輩靠耕種生存，靠耕種生活，為什麼今天我就不懂得種田了？因為我再怎麼種生活好像都沒有得到改變，再怎麼種都依然是很窮的” (何慧麗、古學斌等，2009: 7)。
- 14 無論中國平民的“男耕女織”，或是中國讀書人的“晴耕雨讀”、“耕讀傳家”，還是民間廣泛存在的秧歌、農耕節日等鄉村文化生活，都表明農耕生產從來都與生活、娛樂、審美、傳承、社區精神分不開。從這個意義上說，21 世紀日本實踐者塩見直紀所提出“半農半 X” (2006) 某方面的意涵一直存在於傳統中國農耕社會中，但塩見直紀還賦予“半農半 X”更多字面以外的當代意義，詳細請參考原著。
- 15 中國城市與與之相應的現代社會保障體系，自然無法為這麼多的人口提供養老保障。

分裂著。“身土不二”<sup>16</sup>似乎成為高速發展進程中不乏浪漫但卻略顯奢侈和無實際可能的生活狀態<sup>17</sup>。這些都不同程度的導致農民的整體性認同危機，由之引起他們對於自己傳統技能和鄉村文化信心上的喪失，對於鄉村前途的迷惘與失落都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傳統生態技術作為某種意義上的“技藝”，其存在於各種關係網絡中，同時嵌入在廣泛的社群、宗教與知識論的領域和語境中（馬格林，2001：308；丹尼爾·A·科爾曼，2006：20-21）。但伴隨著農業商業化的出現，由於失去了與社區和熟悉語境的整體性關聯，農民所知變的越來越零碎，“農民的知識被吸納到一個更強大、更理性化的話語裡，受到關於新技術和新目標的資訊和規勸之框限”，同時被編入一張由狹義的技術性資訊所織成的天衣無縫大網，當中農民“已知的”、“不太清楚”和“不懂得”的界限越益模糊。“鄉土社群自身的知識論結構因此而被視為落伍，這與分割了的技術和環境，以及社會和經濟分層的知識剛好相符，它強化了鄉村地區的不平等和支配性的結構”（阿柏杜雷，2001：209、215-216、234）。

由此可見，借農民選擇之名進一步邊緣農民，並將複雜脈絡簡化和單一化，既造成身處現代化進程的農民們從“被代言”到“失語”這一基本現實，更使得鄉村建設這樣嘗試在主流中突圍的“另類”實踐空間有限。

### 3、生態建築的“力”與“困”

自 2004 年始，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一直在嘗試大眾的、從生產領域開始的、農民可以參與的生態實踐，也可說是一種從源頭開始的可持續生產與生活。在臺灣建築師謝英俊<sup>18</sup>的推動下，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 2005 年成立了生態建築工作室。所試驗推廣的鄉村生態建築正是基於農民廣泛的基本需求與可持續發展這一基本原則。一方面，因地制宜的使用可回收再利用或農民可自己生產或就地取材

---

16 日本和韓國這樣與中國有著共同小農經濟傳統的鄰國，都在與快速城市化浪潮相伴的社會運動中喊出這個意味深長的“口號”與原則，無疑是值得我們反思的。

17 在如此情況下，如果用一種“外來”角度和浪漫化的說法去讓“本土/鄉土”人堅守“原生態”與“田園之美”，並進一步“審美化”而抽離生計與生態的角度，且不說單純從“文化”角度出發去改變“文化”是否有效，這種由“自我”出發以想像“他者”的要求，難道不正是當前城鄉分割與定型化偏見的文化土壤？而現實中城市與鄉村、生產與生活的分離與割裂，幾乎很少受到質疑。

18 關於謝英俊建築師及其觀念與工作，詳見其工作室網站：

[http://www.atelier-3.com/mediawiki/index.php/Main\\_Page](http://www.atelier-3.com/mediawiki/index.php/Main_Page)，2012 年 2 月 5 日流覽。

<sup>19</sup>的建築材料，如木、草、土，減少建築垃圾及加工、運輸過程中的能源消耗，同時因這些材料（木、草等）使用之前都需生長，其過程本身就因吸收二氧化碳而對環境有利。另一方面，發揮這些天然建築材料的優勢，結合各地傳統智慧與現代建築科學，真正蓋出居住舒適的房子，比如採用保溫的草土牆體、高效節能炕等。在這一過程中，還將建築知識平民化、使用簡單工具與技術，以便於普通農民的學習和掌握，以此形成在地化的自主營建體系，使之成為當地社區生態建築的建造者和推廣者。立足這些基礎，進一步發育出“在地”能夠獨立發展與自我服務的合作組織，有效引導農村剩餘勞動力參與協作。

除便宜外，房子的結構功能還需能夠滿足村民的生活生產需求。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農村所能找到的一切資源都可能用來建造房子。謝英俊曾說道：“沒木頭，用石頭；沒石頭，用泥土；沒泥土，那就竹子；竹子也沒，秸稈你總有吧”（轉引自王雯婷，2012）。這是生態建築的材料觀。其所經常採用的另一類“輕鋼”材料抗震性好，但造價高昂。謝英俊通過 10 年試驗簡化了該結構，使其變得可預置、開放性、組裝簡易、空間靈活，所有銜接處均採用螺栓固定，讓村民不請專業施工隊也能夠把房子蓋起。正是完全不設門檻的建房技術，材料充分當地語系化後可降低的成本支出，讓生態建築與其他農房相比具有獨特的優勢<sup>20</sup>。

但其推廣卻在現實中“遭遇”到許多阻力與困難，筆者認為首先是來自于以現代都市美學為導向的特定“意義系統”。面對已經被強勢傳媒和房地產廣告深刻影響過的村民，無論是河北定州翟城村還是河南蘭考賀村，生態建築都不同程度面對著理念與文化層面上的挑戰。一篇題為《蘭考合作建設生態房的理想與現實》的通訊，生動記錄了當地農民對待生態房的兩極化態度：“有人覺得加入合作社協助蓋房的方法不錯，有人覺得問題多多——已經參與蓋房劉建忠妻子門鳳枝指著對門鄰居家貼著花花綠綠瓷磚的小樓一臉的羨慕，蓋個房子不就是圖氣魄漂亮嗎？這房子像個啥？將來娃子相媳婦都難”<sup>21</sup>。這個理由和河北定州翟城村某戶準備推廣的村民如出一轍，雖然她擔心因此娶不上媳婦的兒子當時還只在上

---

19 我們不應忽略目前以消費為導向的流通模式正在強有力地推動農民不計生態成本的開掘資源，以利於資源的自由流動並形成所謂市場意義上的最優配置，而非考慮本地的實際需要。雖然它在一定範圍內增加了效率，但卻也在生態意義上增加了成本。這些流通環節也如不持續的生產方式一樣大大增加了能源消耗。生態建築的就地取材既希望減少由此導致的能耗，同時也確保各資源在本地的合理流動。

20 參考自：王雯婷，“謝英俊的鄉村住宅產業之路”，2012，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a3038>，查閱時間：2012/01/03。

21 詳見：朱長振，2007，《蘭考合作建設生態房的理想與現實》，  
[http://www.snzg.cn/article/2007/0630/article\\_6403.html](http://www.snzg.cn/article/2007/0630/article_6403.html)，2012年5月8日流覽。

小學。原因為何？她們同樣都認為這個房子用的材料太“土”，雖然她也承認土牆冬暖夏涼。可見“土”的擔心不是來自實用角度，也不是技術層面的問題，而是在現代和城市雙重座標參照下，大眾傳媒參與重構後反觀的產物。

除此以外，生態建築工作室於 2004 年暑期在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修建的尿糞分離式生態廁所在推廣中同樣遭遇“責難”。之所以選擇廁所作為鄉村生態建築的切入點，因為它是一個十分關鍵但卻常被忽略的世界性議題<sup>22</sup>——農村中的人畜糞便是生態農業中的重要肥料，但當前我國肥料投入中只有約 35%來自有機肥（國仁城鄉（北京）科技發展中心生態農業工作室，2009：25）。即使我們無需將其轉化為肥料，只要未進行一定處理，這些人畜糞便不僅會造成農村居住環境的髒、亂、差，並已日益成為病菌傳播、影響農村生活品質的重要原因<sup>23</sup>。但我們是否有條件在農村地區全面推廣“衛生的”抽水馬桶呢？且不說它將損失大量有機肥料，僅使用大量水<sup>24</sup>這一高耗能處理前提就讓很多缺水的農村地區沒有推廣的任何可能性。

正是基於這一兩難困境，鄉建學院修建了尿糞分離式生態廁所並進行了推廣。該廁所嚴格實行尿糞分離，既確保糞便乾燥而減少臭味，加草木灰等無害化處理後可直接還田，節水與改進衛生條件兩不誤。廁所建設則充分利用本地可回收的生態建築材料（草、土、柳條），相比磚及水泥的製造過程所要消耗能源並釋放大量二氧化碳來說，這些來自本土的天然材料在生產過程中能夠固定二氧化碳<sup>25</sup>。通過“減量化——只處理必須處理的糞便；無害化——處理掉污染環境與危害人體健康的有害病菌；資源化——自然能源與糞肥的迴圈應用，減少化肥的施用量；節水——少用或幾乎不用水（國仁城鄉（北京）科技發展中心生態農業工作室，2009：29）”，小小一個生態廁所，多角度的體現了生態可持續理念。

然而很多人卻認為這樣的工作無足輕重，甚至有長期參與社會運動的朋友在網上稱這一舉動是對翟城的“文化侵略”，其他回應者乾脆建議將晏陽初鄉村建

---

22 據研究顯示，目前世界上總計約 40%的人沒有廁所（國仁城鄉（北京）科技發展中心生態農業工作室，2009：14）。

23 “從集中的水沖式收集系統的下水道中排出的污染物是全世界水污染的主要組成部分，目前世界上只有約 3 億人的污水在排入水體前經過了末端二級處理。污染物通過下水道、化糞池、坑式廁所、污水池等滲入地下水”（國仁城鄉（北京）科技發展中心生態農業工作室，2009：15）。

24 “它需要 30 倍以上的水沖洗少量的尿和更少的糞，糞、水混合後，使需要處理的糞汗大量增加。同時據初步估計，沖廁用水占日常生活使用總水量的 35%之多”（國仁城鄉（北京）科技發展中心生態農業工作室，2009：導言 1、正文 14）。

25 不僅不污染環境，按照《京都議定書》要求，將來向大氣中超量排放二氧化碳是要付費的，而這種相反做法將可以得到生態補貼。

設學院更名為“晏陽初鄉村廁所學院”（國仁城鄉（北京）科技發展中心生態農業工作室，2009：57）。

這種不屑與汙名化所體現的日常生活盲點，恰好說明主流社會的影響已不受覺察的滲透進以“反主流”為目標和旨趣的主流社會運動中：既因其在物質層面上不帶任何反思的接受“馬桶”這一包含著複雜文化經濟生態脈絡的“產品”，更由於其準備通過“反抗”所努力爭取美好生活的主流“想像”——只是以都市化和西方化為參照並以中產階級趣味為導向，而馬桶“崇拜”背後對現代“潔淨”觀念的不言自明則是其合理延伸。正是這種看似“就廁所論廁所”的“去脈絡”處理和來自主流文化的定見，遮蔽了鄉土社會及各種來自生態等限制的因素，強化了我們對“三農”的“偏見”，進一步影響了農民對“好生活”的標準與定義。

除以上來自一般公眾文化觀念的“偏見/定見”外，這些“另類”實踐還直接“遭遇”著更多利益上的挑戰與政治經濟因素的其他影響。比如強調農民在建材、技術開發等方面需“自主、獨立”的生態建築一開始就面對來自各利益相關方或大或小的阻力，其中包括：建築材料供應商、“城市中心”的建築知識生產者、追求“樣板化/社區化”農村建築規劃部門……，迫使生態建築最後在河北終止<sup>26</sup>的主要原因則是其被指認為“非法建築”的“審批權”與“專業資質”<sup>27</sup>。專業主義下的類似門檻作為一種商品化及“去社區信任”產物，符合已有的固化利益結構，排斥著成為潛在技術開發者與改進者（土發明，工匠）的可能存在，維護和繼續著技術的日益壟斷與神秘化，更壓縮了“另類”與弱勢群體進行創造性實踐的有限空間。

#### 4、小結

通過以當代中國鄉村建設實踐為案例所進行微觀與宏觀相結合的分析，筆者認為：面對當代社會，“生態/可持續”一方面作為鄉村建設的主要工作內容、重要特徵與全新視角，內在體現著鄉村建設的基本思想與原則。另一方面，生態問題不僅是生態自身的問題，我們既不可在不處理整體脈絡情況下抽象的

---

26 2007年5月15日，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被迫關閉，其理由之一即是學院內的這組在國際建築節獲過獎的中國大陸當代第一組鄉村生態建築群是“非法建築”。

27 其與門檻很高的有機認證一樣，無疑是典型的主流標準與話語系統對來自底層和無權者“另類”實踐的排斥與空間剝奪，並以此鞏固權利與資本的主導地位。

談生態或可持續，也不可能僅在技術層面上孤立的進行相關實踐。

鄉村建設推動的生態實踐絕不僅是拘於“二元對立”陷阱下的簡單回歸，而是批判中的新建構。鄉村建設在進行與生態相關實踐中所出現的困境，也需回到具體而又複雜的歷史脈絡中，重新連接文化、政治、經濟等緯度，在社區與共同價值日趨瓦解的今天，重建可體現鄉村及廣大民眾脈絡之“生態/可持續”的在地化載體、條件與主體性。

### 參考文獻：

- 阿柏杜雷，《印度西部農村技術與價值的再生產》，許寶強 汪暉選編，2001，《發展的幻象》，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阿圖羅·埃斯科瓦爾著，《遭遇發展——第三世界的形成與瓦解》，2011，汪淳玉 吳惠芳 潘璐譯，葉敬忠校，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程式，2004，《當今世界農業發展狀況與中國農業發展（上）》，《中國職業技術教育》，第26期
- 丹尼爾·A·科爾曼著，2006，梅俊傑譯，《生態政治——建設一個綠色社會》，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 顧明，《農業生產與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9月
- 國仁城鄉(北京)科技發展中心生態農業工作室，2009，《糞尿分集式生態廁所理論與實踐》，(內部刊物)
- 何慧麗、古學斌等，2009，《城鄉連結與農民合作》，《開放時代》，第9期
- 何塞·盧岑貝格，1999，《自然不可改良》，黃鳳祝譯，北京：三聯書店
- H·孟德拉斯著，《農民的終結》，2010，李培林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馬格林(Stephen A.Marglin)著，葡永堅譯，潘永忠校，《農民、種籽商和科學家：農業體系與知識體系》，選自許寶強、汪暉選編《發展的幻象》，2001年，中央編譯出版社
- 范達娜·席瓦著，唐均譯，《失竊的收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 樂鋼，《評梵當娜·施瓦的，〈活下去：婦女、生態、發展〉——兼論知識生產的價值問題》，李陀 陳燕谷主編，《視界》，第1輯，2000，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 呂新雨，《農業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道路》，薛毅編，2008，《鄉土中國與文化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 李棠慶，《為化肥鳴不平——兼談解決化肥污染問題的出路》，《大自然》，2004年第四期
- 魯靜芳、左停、苟天來，2008，《中國農業發展的現狀、挑戰與展望》，《世界農業》，第6期

帕沙·查特吉，2007，《二十一世紀農業文化》，張建琴譯，《臺灣社會研究季刊》，9月，第67期

潘家恩，2004，《發展的可能》，《Perspectives》（第四卷第二期），“海外中國青年論壇”。

孫津著· 中國農民與農業現代化〔M〕· 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徐國偉著，2003，《米話唔關你事——亞洲米農的困局》，香港樂施會出版

田松，2010年，推廣轉基因技術首先不是科學問題，《讀書》，第7期

汪暉著，2000年，《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死火重溫》，人民文學出版社

汪暉，“科學主義”與社會理論的幾個問題，《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2008，北京：三聯書店。

汪暉，《環保是未來的“大政治”——打破發展主義共識，尋找新出路》，《綠葉》2008年第2期

文佳筠，2011，《環境和資源危機時代農業向何處去？——古巴、朝鮮和美國農業的啟示》，《開放時代》，第4期

溫鐵軍，董筱丹，石嫣，中國農業發展方向的轉變和政策導向：基於國際比較研究的視角，《農業經濟問題》2010年第10期

張樂天，2005，《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詹姆斯·C.斯科特著，2001《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程立顯等譯，北京：譯林出版社

中國人民大學重慶課題組，2011，《重慶新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周立，2010，《極化的發展》，海口：海南出版社。

楊帥、溫鐵軍，2008，《發展生態農業的國際經驗及本土試驗研究》，《環境保護》，第15期

約翰·貝拉米·福斯特，2006，《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耿建新、宋興無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塩見直紀，2006，《半農半X的生活——順從自然，實踐天賦》，臺灣天下文化書坊